

昭显生活 随性灵动

——汪曾祺散文创作论

王艳蕾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系,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秉承传统儒家的文化人文精神,生动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和百姓日常生活,个性特征鲜明,文化意蕴醇厚;他将传统绘画思维融入散文创作中,以画造境传情,语言随性灵动却不失质朴通俗,成就了其散文独特的艺术神韵。

[关键词] 汪曾祺散文;儒家传统;民俗风情;以画入文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120-04

Showing the Spirit with Life, Natural and Full of Life

——On Wang Zengqi's Prose Creation

WANG Yanle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Fujian Jiangxia College,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Wang Zengqi's prose creation inherits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and shows the colorful folk customs and people's daily life vividly. It has impressiv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llow cultural implication. He transfers traditional painting thinking into prose writing and writes with painting techniques, which gives his prose unique artistic charm.

Key words: Wang Zengqi's prose;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folk customs; writing with painting techniques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涌起了一股“散文热”的浪潮,散文成为文人和读者竞相追逐的对象,其影响颇为壮观。这一时期,汪曾祺开辟了独属于自己的散文空间,凭着对生活独特的审美感悟,写凡人小事,记民俗乡情,谈虫鱼花鸟,考典故辞章,以随性灵动的艺术神韵昭示生活,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本文拟从汪曾祺散文入手,对其散文独特的审美理想、文化意蕴和艺术神韵进行梳理与论述,进而获取对其散文的整体感知。

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儒家传统文化人文理想的熏陶,儒家传统人文精神可以说是汪曾祺的精神命脉。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

神,它关注人本身自我的主体性,关注个体的人自由运用权利和自由发展情感意志,而人道主义则是人文精神的内核,正如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文中说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1]53} 儒风儒骨入世的人文关怀成为其审美理想之所在。作者的这种悲悯人世的人文主体情怀必然会对作品创作的主旨意蕴产生很大的影响,渗透在其诸多华彩散文篇章中,使其作品拥有一份独特的儒家人文韵致。他希望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

收稿日期: 2013-05-26

作者简介: 王艳蕾(1978-),女,福建福州人,福建江夏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汪曾祺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

他的作品明显蕴含着强烈的悲悯情怀和人文意识,蕴藏着严肃而淳朴的民间关怀。他的饮食散文中,炒米、萝卜、豆腐、咸菜、豆汁、炒米、焦屑等,都是不起眼的食物,其中很多是灾荒之年老百姓的活命之物。这些吃食表现了作者对民间百姓生活的关怀,对其当时艰难生活状态的思索审视,可以说,饮食的背后是作者悲悯人世的人道关怀与思考。这些饮食散文中隐藏了一些苦味,而这苦味恰恰体现了他人道主义的温情、悲天悯人的情怀。汪曾祺骨子里是入世的,虽苦味犹存,但不愿意流诸笔端。他将哀愁隐藏得很深,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能给人间送温暖,在苦中提升出典雅的人间美,在慈爱的目光中永远流出纯澈的爱意。除了饮食散文,在纵论文化怀念故人的篇章中,汪曾祺更是直接挥洒人文精神,比如《金岳霖先生》一文,透露出作者要求对人的价值慎重估定的强烈呼吁,《林肯的鼻子》一文,作者倡导的是一种平等自由博爱的人权精神。这类篇章无不与人文精神要求关注个体的人自由运用权利和自由发展情感意志的精神实质遥相呼应,显示出悲悯而温暖的人道主义情怀。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重人伦、重和谐,倾向于以平和来展现艺术内容,在平淡中看出最深的喜悦和悲哀。汪曾祺深得其中的真谛,他多次强调自己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重返文坛,当时的中国正热火朝天地走向改革开放,他深感现代社会的喧嚣与紧张,人们被忙碌所包围挤压,于是,他凭借他独有的文化审美理想,从小的视角切入,写凡人小事,记乡俗民情,谈花鸟虫鱼,述山水名胜,娓娓而谈,让读者感受文中那宁静、闲适、恬淡的气韵,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这不正是儒家心目中的和谐吗?

在汪曾祺看来,和谐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命的圆润,也是一种审美的理想。和谐是其文章的生命,和谐不仅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是生命的和谐。自然永远是生命的基础,文学表达脱离了自然,就会失去生命的气场。在其笔下,一草一木总关情,他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照,寄托在植物书写中,充满声音、色彩、味道生命描述,洋溢着土地和汗水的鲜活生命气息。《葡萄月令》从一月葡萄藤“冬眠”开始,一直写到十二月份再次“冬眠”,展现给读者葡萄园中一年的劳动情景,劳动充满了诗意与活力,人因为劳动而充满了

喜悦、激情和希望。《夏天》写了各种各样的花卉,姹紫嫣红的花花草草,美丽而茂盛,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枸杞》中,其花、叶、果实皆跃然纸上,鲜活可感,通篇洋溢着生活的乐趣。汪曾祺笔下的草木植物,是其安放灵魂的绿色精神家园,他在绿色海洋中徜徉,呼吸花木的清新芬芳之气,与天地精神往来,以期寻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澄明之境。其笔下,一山一水亦关情,《泰山片石》中,他涂抹泰山云雾的灵动迷离:“雾在峰谷间缓缓移动,忽浓忽淡,远近诸山皆作浅黛,忽隐忽现。早饭后,雾渐散,群山皆如新沐。”^{[1]213}以如诗画笔,描山雾忽浓忽淡,绘群山忽隐忽现,雾散山如新沐,充满着诗的意境。将儒家思想寓于澄澈宁静的山水间,以艺术化的手法将山水游历中的见闻感受创设出自由灵动、宁静悠远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对于现代人是具有感召力的,以山水的灵性感召人的生命灵性,人与山水和谐共生。汪曾祺对于和谐的追求,是对世俗美与爱的张扬,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它沟通了生活与艺术,显现的是高贵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二

20世纪80年代,阿城、贾平凹、韩少功等作家别开生面地提出了文化寻根的文学主张,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根深则叶不茂,主张作家创作应从民族文化和大自然中寻求精神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汪曾祺,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建构了其作品的永恒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2]

他对于民间文化的热爱,源于他的家庭。他生在一个带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开明之家。童年时期,祖父教他《论语》、书法,祖母教他品味鉴赏饮食文化。父亲是一位“通才”,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还善做手工艺品,汪曾祺深受熏陶。这种父辈传递给他的东方艺术及精神,无疑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成年后,他曾多年从事与民间艺术密切相关的工作,在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会工作过,当过《民间文学》等杂志的编辑,这些经历无不促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民间艺术专家。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风俗中保留了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并对这中童心加以圣化,”^{[1]281}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对维系民族感情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民族感情虽然抽象,但它通过风俗形式而得以丰富地再现。他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宽容的情怀和开阔的视

野来描绘我们民族的心理以及各地的风俗,以此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民族。风俗即人情,风俗可以成为人活动和心理的契机。^[3]民俗当中总有一种率性的人生现实,且蕴藏着民间社会民众的情绪。在《胡同文化》里,胡同联系着北京,北京又联系着北京人。胡同的“方正”,给北京人的生活以及思维方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者通过北京城表面格局的“方正”特色看到了北京人的性格。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次来看,民间文化本真地反映了老百姓观察世相人情的独特心态,体现了民间大众的心理情绪。

汪曾祺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力和农民朴素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并尽量将其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中。正如孙郁所说:“中国人平淡无奇的生活在汪曾祺作品里体现了一种自然的、无冲动的、永恒的神力,它体现了生命自身的含蓄、平稳的特征。”^[4]在《岁交春》中,汪曾祺写了家乡的一个“送春牛”仪式,即在立春日将穷人制涂了有颜色的泥牛送到各家,还有人家将称为“芒神”的小泥人供于神案上。在汪曾祺这样的懂得民俗意义的人看来,这些朝山进香、敬神拜佛、免祸求福的行为以及迎神庙会里面所表现的艺术文化,恰恰是我们民族很重要的民俗文化。在《故乡的元宵》《昆明年俗》《水母》《端午的鸭蛋》等文中,他满怀兴致地描写了送麒麟、抖空竹、看走马、嚼葛根、腌咸蛋等各种各样的节日仪式,字里行间亦洋溢着生活情趣。汪曾祺的民俗散文以一种求知的态度,谈风俗掌故,把自己所赏识者变现于文字间,将自己的思想在知识与趣味中表现出来,独具魅力。如《城隍·土地·灶王爷》中,以“祭灶”为例,汪曾祺辨别了“祭灶”的起源,一路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豆腐》中,从种类上的北豆腐、南豆腐、豆腐脑、豆花、水豆腐、臭豆腐、豆腐干到做法上的拌豆腐、烧豆腐、扬州和尚豆腐、麻婆豆腐、昆明小炒豆腐、沙锅豆腐及家乡的“汪豆腐”,整篇文章可谓琳琅满目,做法、传说、典故让人目不暇接。

汪曾祺的民俗散文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民间美食散文系列。美食是中华民俗传承的载体,在其笔下,吃不仅是人的一种生理需求,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境界。他在文中对各种民间美食如数家珍,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美食民俗文化。汪曾祺生于高邮,求学于昆明,蛰居于上海,下放于塞外农场,后长期定居于北京,可以说,中国大江南北的生活他都体验过了,如此丰富的阅历没有几人能企及,这样的经历成就了他笔下各地美食的清明上河

图,展示了各地的美食民俗。《故乡的野菜》《故乡的元宵》《端午的鸭蛋》承载了他记忆深处童年故乡的温馨,《昆明的果品》《昆明的吃食》是他对昆明的深情回味,《豆汁》《胡同文化》是老北京的市井印记,《咸菜与文化》《食豆饮水斋闲笔》《吃食和文学》《食道旧寻》等篇章在娓娓道来各地美食之余还谈及美食中的文化底蕴。汪曾祺笔下的食物从来没什么鱼翅海参、鲍鱼赤肚,有的都是些寻常百姓家的日常吃食,是民间俚食。炒米、豆腐、萝卜、咸菜、蚰子常常见诸笔端,这些民间俚食最能代表汪曾祺亲近民俗的民间立场,折射出他对底层民间的亲合力,对民间日常生活的挚爱,折射出老百姓世事兴衰中的浓浓人情,寄兴叹于物事,寓哲理于风情。

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的散文才情横溢,那坦率酣畅的激情、繁复华丽的意象,如春华大地,万卉竞放,不由得你不动心。但也有另一种散文,虽不大引人注目,但却十分耐人品读,仿佛山谷里的幽兰,默默地吐露清香,动人于不知不觉中,像润物无声的春雨,有着特别的情趣和深长的情意。汪曾祺的散文便属于这一类,其散文好比杭州西湖的龙井茶,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却有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行文舒展,娓娓道来,或抒情,或叙事,或写景,或说理,都使人感到是那么恬淡从容,舒徐自在,不摆架子,没有丝毫的浮、虚、厉、躁之气,有一种真率亲切的本色之美。汪曾祺的小品散文富有的这种本色生活思想的魅力,可以说得益于其散文创作的手法。

汪曾祺善于将传统绘画思维融入散文创作中,以画造境传情,随性灵动。他有深厚的传统美术修养,绘画和书法两方面的修养尤其突出,因此,他的散文让人产生一种对古代写意山水的感性的理解,而中国写意山水回过头来又能图示其散文的审美情趣。“气韵生动”这种传统绘画美学的命题,对一些现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在用文字刻画人物、描绘自然时,往往努力追求“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意境创造”的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一些现代作家,他们用文字创造的意境,往往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似是人间所有,又总非人间所有。汪曾祺在其散文中常常以画意构图,很少大段的景物描写,很少层层铺排感情,这使得其散文就像一幅写意画一样,气韵生动,意境优美。《天山行色》中,他以寥寥数笔就描绘出天池那如山水画般的景色:

“天池的水,碧蓝碧蓝的。上面,稍远处,是雪白的雪山。对面的山上密密匝匝地布满了塔松,——塔松即云杉。长得非常整齐,一排一排地,一棵一棵挨着,依山而上,显得是人工布置的。池水极平静,塔松、雪山和天上的云影倒映在池水当中,一丝不爽。”^{[5]135}这完全是一幅气韵生动充满意境的国画。汪曾祺将传统绘画技艺用于新文学创作,以画入文,其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为我们建构了一个自由灵动、宁静悠远的艺术境界。

以随性灵动的语言进行创作,也是汪曾祺散文的一大特色,他极其重视语言在文本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语言具有文化性”,“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5]282-284}对语言功用的独特认知和重视,直接影响了其作品语言的风格。语言随性灵动体现在多方面,或诗化典雅,或通俗平易,或幽默风趣,或妙用修辞。他以视角的独特、表现手法的细致、感受的敏锐将旅途中景物山水描绘得如诗如画。如在游览温州永嘉水仙洞时作《水仙洞歌》,“往寻水仙洞。却在山之巅。想是仙人慕虚静,幽居不欲近人寰。朝出白云漫浩浩,暮归星月已皎然。不识仙人真面目,只闻轻唱秋水篇。”^{[1]260}诗化典雅的语言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山水风光、草木鸟石的同时,亦绘声绘色地传达了作者对自然之美的赞叹与追求。其语言随性质朴通俗平易而富有亲和力,舒缓而有节制,常似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其怀念故人的文章《星斗齐文,赤子其人》《金岳霖先生》《老舍先生》均已通俗口语写作,可以说是无技巧的技巧,每一句话都源于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从使这些他所怀念的故人可亲可近。通俗直白的语言,在饮食散文中也比比皆是,《胡同文化》中写道:“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皮熬白菜,嘿!”^{[5]158}简单的语言,饱含浓浓的京味儿,将老北京的吃食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哪个层次的读者都看得懂。汪曾祺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就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1]290}这幽默是生活化的幽默,常常不动声色,无关影射与批判,能让人在读罢莞尔一笑。《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

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端午的鸭蛋》写到:“我在苏南、浙江,每逢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我对于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1]100}字里行间俨然有着孩童般的稚气,让人不经意地想笑出声来。“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1]100}可见作者对于故乡咸鸭蛋的钟爱无与伦比,语气中又带着自豪又带着骄傲的,读罢不笑都难。汪曾祺的语言是多样化的,妙用修辞也是其中之一,各种修辞的巧妙运用总能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想。且看《葡萄月令》的语言:“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喂奶似的拼命往上喂”。^{[1]180}其以拟人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对葡萄的深厚感情,葡萄似乎不仅仅是葡萄,简直就是他亲手拉扯大的孩子,语气里满是疼爱、亲昵、揶揄。

总之,汪曾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有机继承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并于动人的篇章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文化内容,昭显了百姓生活,使读者感受到了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的美学风格,而其以画入文、语言随性灵动的散文艺术神韵,亦颇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因此,昭显生活,随性灵动,无疑是汪曾祺散文的最佳诠释。

参考文献:

- [1] 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2] 吴正锋. 沈从文小说创作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23-128.
- [3]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3.
- [4] 孙郁. 汪曾祺的魅力[J]. 当代作家评论,1990(6):65-69.
- [5] 汪曾祺. 随遇而安[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黄声波